“另起炉灶”开外交新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二三事

郑策士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新中国外交的航船劈波斩浪，驶向崭新的航道。

面对帝国主义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面对争取世界各国对新中国的承认以及与各国开展贸易等诸多外交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另起炉灶”的外交战略，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不承认任何外国原有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从这时起，组建新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不拘一格　广揽人才

新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要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如此艰巨的历史使命，需要一支崭新强大的外交队伍来承担。

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为外交队伍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建议下，中央从军队和地方抽调了一批文化水平较高、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充实外交队伍。他们中间有原中央外事组及从事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同志，这些人有一定的外事工作经验；有刚刚走下炮火硝烟战场的我军高级将领，后来大多成为首批驻外大使。此外，还招收了一批懂外语、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处理日常外交业务；吸收了一些国民党时期的国际法学者、专家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顾问、专员等。

为了帮助那些久经沙场的将军们顺利转换角色，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专门为这些“将军大使”开办培训班，请专家学者讲授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联合国宪章》等。将军们拿出战争年代打攻坚战的劲头，刻苦学习，进步很快。周恩来还请“将军大使”们到中南海勤政殿观摩递交国书场面。遵照他的嘱咐，将军们站在红木雕屏风后面，从缝隙中观摩外国使节向毛主席呈递国书的仪式。后来，这些“将军大使”以一种全新的外交风范走上国际舞台。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就是这样边学边干，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许多重大外交任务。

非常时期　非常做法

为了迅速打开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局面，当年曾采取了许多非常规的做法。

一是外长任命在前，外交部成立在后。开国大典当天，毛泽东在勤政殿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按照外交惯例，周恩来当天须以外长身份亲笔签署向各国原驻华机构外交代表发出的第一份公函，要求他们将毛泽东主席的建国公告送达本国政府。而此时，外交部机关的工作班子和组织机构尚未搭建，一些具体工作还是由原中央外事组一班人马完成。一个月后，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基本建立，并上报政务院。12月16日，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正式通过了对外交部各部门负责人的任命。

二是开展外交活动在前，办公大楼选址在后。新中国成立前夕，涉外工作的临时办公地点分别在东交民巷玉河桥的原日本使馆和北京松树胡同。后经周恩来批准，新办公楼最终选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旧址。这是一幢灰色西式建筑，石基砖墙，气势不凡，但却饱尝中国近代屈辱外交的凄风苦雨，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重获新生。

10月5日，外交部首批人员进驻外交部街的大楼办公。限于条件，这里除了办公、会客外，有时还要举行招待会。由于没有能容纳几百人的房间，招待会的宾主常常要分散在几处。周恩来不得不到一个个房间向客人祝酒。一次招待会进行中突然断电，周恩来就举着蜡烛走到各个房间向来宾祝酒，与他们攀谈。房子是老的，家具是旧的，但同志们毫无怨言，大家都怀着对新中国诞生的喜悦和肩负使命的责任感，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

三是首位驻外使节带着特殊外交“护照”赴任。新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是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十天即赴苏联上任，来不及制作护照，只好为他开具一封证明信，请苏联政府关照。王稼祥所携带的国书是新中国发出的第一份国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和外交部长周恩来副署，并在他们的签名下加盖了个人印章。

简朴仪式　光辉起点

1949年11月8日，当外交部有了工作人员、办公地点、组织条例并正式开展对外活动后，成立大会才正式举行。此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同苏联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等重要工作。

当晚8时，紧张忙碌了一天的周恩来在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的陪同下走进会场。他看见礼堂里坐了很多人，高兴地说：“炳南，你找了这么多人！好，今天我们正式宣布外交部成立。”当时会场有近170人，大家围坐在桌子四周，周恩来和部领导坐在前面。周恩来打开花名册逐一点名，遇到不熟的询问一下，点到熟人，还开一两句玩笑。会场时常发出笑声，气氛融洽、轻松而热烈。

大会由王炳南主持。简单的开场白后，周恩来开始讲话。他首先阐述了国际形势和新中国的外交任务，之后他强调：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他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照法办事。

周恩来叮嘱在座的同志：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今天这100多人，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磨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周恩来要求每一个外交人员坚持坚定的政治方向，遵守严明的组织纪律，保持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直到今天，每个外交干部依然自觉恪守这些要求。

最后，周恩来向大家提出一个建议：我们的同志大部分才工作不久，外交的知识及一般的社会知识都不够，因此要紧的是学习，每星期至少要有几个小时学习。我们在工作中固然是学习，但是在学习中也要学习。我提议，在我们的外交机构中，要建立起新的学习制度来。大家热烈鼓掌，对周恩来外长的倡议表示拥护。

6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170人的外交队伍如今已发展到5000多人，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也已达到171个。这是外交战线一代又一代人披荆斩棘、无私奉献、忘我奋斗的结果。在纪念新中国外交60年之际，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记忆并不尘封，那些往事将激励并指引我们为中国的繁荣富强继续奋勇前行。

走出城市“森林”

顾玉清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然而城市化打造的钢筋混凝土“森林”，在给人类生活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也衍生出五花八门的“城市病”，并由此引发“围城”效应：城外的人想要挤进来，城里的人渴望走出去。

在城市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走出城市“森林”已成为城内居民的一种时尚。就法国巴黎这样的大都市而言，且不说每年7至8月度假高峰期，全城会出现万人空巷的现象，即使平时周末也少有人在城里呆着，而是举家出动来到郊外。在那里，他们或跑步、骑山地车、打滚球、垂钓，或在林间草地上聊天、野餐、慵懒地享受阳光。许多人周五晚上就带着帐篷、油灯、食物等离开喧嚣的都市，直到周日的最后一刻才返回，每到这时，各路段回城的汽车像蜗牛爬行，绵延数十公里，场面十分壮观。

通过日常接触我才知道，巴黎普通市民在城里的住房其实并不大，六七十平方米的居住面积最为常见，特富的主儿也未必有多大的豪宅。在他们看来，城里只是工作的地方，他们真正的生活点应是远离城市的乡间别墅。当然，也有部分人购住流动房车，或者以一艘漂泊的游艇为家，更为时尚的一族择林而栖，乐做“树上人家”。

发端于美洲的“树屋热”，现在似乎也成了欧洲爱好者们追逐的目标。远足山野、公园、森林，在离地面几米甚至几十米的空中，借助树杈树干巧妙搭建“树屋”。根据个人的不同需要，“树屋”可以简陋到只能容下一张床，屋中无水、无电、无卫生间，一切追求“自虐”式的原始状态。豪华的“树屋”则精致舒适，浴室、厨房、客厅、电灯、电话等一应俱全。随着“树屋”设计公司的诞生和一年一度的“世界‘树屋’大会”召开，“树屋”的建造更加艺术、多元和迅速。注重休闲的法国人早就将“树屋”建到了孚日山、阿尔萨斯山和阿尔卑斯山的森林里，不仅自己享用，而且还用于出租。在旅游旺季，游客爆满，常常一“屋”难求。

“树屋”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生态小环境，它能给人以快乐和满足感。法国汝拉山区的“树屋”发烧友塞德里克说：“生活在‘树屋’里，如同住在一条小船上，风吹树动，屋子在空中荡漾，蓝天树荫下听鸟鸣虫叫，那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感觉，真是奇妙极了！”

眼下城市迅猛扩张带来的问题成堆。拥挤、噪音、污染、失业、犯罪和疾病流行等等，对广大城市居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构成严重威胁。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11亿城市人口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每年因喝不上清洁饮用水造成的死亡人数达1000万之多。如何逐步清除城市中的“危险堆”，让城市回归绿色、回归自然、实现和谐，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走出城市“森林”，走向自然界中的森林，也许这只是人类一种被动的选择。只有让森林走进城市，拥抱城市，人人爱绿、护绿，营造出绿色的家园，城市才会变得更加宜居，更加美丽。

石渊茶亭

他乡怀古

喻丽清（美国）

今夏，美国旧金山的亚洲艺术馆有一个“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展，展出中国近50年重大考古发现，其中精选的240件出土文物，因为具有编年的特殊意义，使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皆有迹可循。

开幕头一天的记者招待会后，我就买了张博物馆的会员卡，打算多看几回。果然，去了又去，总觉得意犹未尽，不知道是对于复古的眷恋，还是想在那些文物身上找到承先启后的再生之秘。站在那些文物面前，好像看到一个曾经玉石俱焚过的废墟又开始重建，心中充满了欣喜与感动。

有的古物出土不过二三十年，所以，尚未考出个所以然来。最奇的是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面具和铜人，“长”得极像印加文明中的古物。我把那展览海报上的“带金箔人头像”拿给当地美国人看，都问“这是秘鲁挖出来的还是墨西哥的？”我于是打趣道：“公元前2000年中西文化就已经交流了，信不信由你。”

不过，以前倒是真有人质疑过中国的青铜制作并不是世界首创，但中国的制品最为精美，却世所认同。

这次看到许多青铜礼器酒具，有重200多公斤的大鼎，有写满文字的青铜盘，便想起布鲁诺斯基在《文明》书中所写的：“青铜，是商代的塑胶。”那样笨重的金属，在商代却像塑胶一般可以随心所欲地制作，也只有布鲁诺斯基那样博学的科学家才形容得出来。

2000年前当中国人做青铜的时候，欧洲人正在做巨石柱。人类好像同时都聪明了一下子，可惜当时还没有“作家”这一行，不然记下来他们的所思所感，该多有意思。

因此，在陶器与铜器上出现的字，比图案更使我惊异。以前在文学史上读到散文的写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散氏盘”上所记述的文字。那种“坚如钢铁”般的文字，也许是最早的散文呢。展览中看到一个青铜盘（史墙盘）上有铭文，记载了最早7位周天子以及微氏贵族家庭5代成员的丰功伟绩。虽然对那只大铜盘肃然起敬，可是在它面前自己也只能算是文盲。那种既有趣又庄严的感觉，还是生平第一次。

至于秦始皇的兵马俑，因为在西安已实地见过，并不觉得怎样可观。几千兵卒合葬的墓穴的慑人气势，非亲临其境不能感知。

在这些超时空的艺术品上，美与熟练技巧的结合，不就是天人合一吗？什么是比生命永恒的东西呢？我想起日本有名的导演小津安二郎的墓志铭来，那墓石上只刻了一个字：“无”。无不等于空，在禅学上，“无有”反而是一切的意思。这些看似不会生长的文物，却有着多么美丽的生命啊。

秋染英伦

人民图片

流水欢歌

王忠范

和朋友相约去看新加坡河，在绿树荫掩的人行道上漫步轻走，看蝶舞，听鸟唱，目悦心爽。

碧水清波的新加坡河，忽涌浪，忽细流，忽卷涛，其声水灵明快，跌宕有致。我想，这河与天津的海河、海拉尔的伊敏河一样，必然给城市添姿作美，给市民生活注入活力。导游王先生说，新加坡河每年都有龙舟比赛，参与者大部分是华人，规模大，气氛热烈，像过节一样。

河流飘然飞过市区，必架设供来往通行的桥梁，其中数加无纳桥最古老最有名。其实这是一座铁架吊桥，1866年建成，至今已有140多年。多次维修，原有风貌却未改变，古朴中别有韵味。据说月挂树梢时，常有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来此约会，吊桥此时成了鹊桥。

岸旁，有一圈橡胶树，粗枝肥叶，深绿凝重。中间一尊雕像挺立，面朝新加坡河的方向。原来雕像是英国人汤玛士·史丹福·莱佛士爵士，他1819年发现了新加坡岛并且首次登岸，不久，他从巴西把橡胶树引进来，使东南亚有了一个新的树种。后人为了纪念他，雕此石像作为纪念。

沿着河滨一路前行，进入一条约半公里长的商业街。高高低低的建筑全为中式模样，经营者也都是华人。有的经营中国传统小吃，有的出售中国特产，当然也有世界名牌商品。大多数西方游客来新加坡观光，都会到这里购物，也许他们真的把这里当成了了解中国的视窗？

在商业街的那边，我们发现一棵棵像伞一样的树。王先生说：“这是新加坡著名的雨树。”雨树枝干壮实，叶子紧密如五指并拢，竭力向四处蔓延。此刻虽然无雨，站在树下，发现头上密无缝隙，连阳光都射不进来。王先生让我们去看兰花，那是新加坡的国花，这种兰花通体纯蓝，丰腴润泽，高洁秀雅，且绵厚清香。望树观花，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

树影间，有人弹奏起中国歌曲《祝酒歌》和《泉水叮咚响》，旋律伴着河水流淌，让我生出一分他乡遇故知的喜悦。

千塔之城开罗

黄培昭

徜徉在埃及首都开罗的大街小巷，数不胜数的清真寺以及寺顶上高耸入云的宣礼塔随处可见，它们构成了开罗伊斯兰艺术的主要特色，使开罗名符其实地享有“千塔之城”的美誉。正因为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将“伊斯兰的开罗”列入人类文化遗产名录。

“千塔”指的是清真寺的宣礼塔。有人说，开罗城就是一座伊斯兰博物馆，也是清真寺的大荟萃。在开罗常驻期间，我几乎天天与这些造型各异的清真寺和宣礼塔谋面，这些个性鲜明、反映不同时代风格的建筑，也成为我对开罗美好记忆中最难忘的篇章。

公元639年，阿拉伯名将阿穆鲁·本·阿斯远征埃及，于641年率兵从西奈半岛进入尼罗河流域，在巴比隆以北建城，取名福斯塔特。这便是今日开罗的前身。他以此为据点挥戈征战，统一了埃及全境，并在福斯塔特修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非洲大陆第一座清真寺，标志着埃及从此进入伊斯兰时代。今天，开罗城东南仍保存着福斯塔特遗址，旁边就是古朴凝重的阿穆鲁·本·阿斯清真寺，人们还在原地修建了福斯塔特公园，以示纪念。

脱离阿巴斯王朝独自在埃及为政的艾哈迈德·图伦王朝，建造了螺旋式上升外形的清真寺，清真寺的外侧有螺旋状阶梯，宣礼塔也是螺旋状的，而且这座清真寺的宣礼塔被认为是埃及最古老的宣礼塔。今天，艾哈迈德·图伦清真寺得到了完好的保存，人们通过一层层螺旋状的阶梯登临顶端，俯瞰四周，历史沧桑感油然而生。

公元969年，法蒂玛王朝统治埃及后，在福斯塔特以北建城定都，起名开罗，意为“征服者”、“胜利者”。从此，开罗开始逐步走向辉煌。法蒂玛王朝大将玖海尔972年建造了大名鼎鼎的艾资哈尔清真寺，寺有8扇大门，380根结实的大理石圆柱支撑着三面的各个大厅，光宣礼塔就有5个，气势夺人，其中具有两个尖顶的卡特巴宣礼塔是艾资哈尔清真寺的标志。988年，这里又建起了艾资哈尔大学，它是最早的伊斯兰高等学府。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清真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开罗到处都弥漫着浓厚的伊斯兰气息。

打败十字军的阿拉伯民族英雄萨拉丁1171年废黜法蒂玛王朝，建立阿尤布王朝。他在开罗建立了著名的萨拉丁城堡，今天，饱经忧患而宏伟依然的萨拉丁城堡，与那里后来建立的、有着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风格的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一起，成为了开罗的地标性建筑，无论身处开罗的哪一个方向，都可以仰视到萨拉丁城堡浑厚的身姿和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挺拔的倩影，清真寺的两座宣礼塔像两柄利剑一样直插云霄。

13世纪，马穆鲁克王朝统治埃及，在开罗建立了被誉为“中东最漂亮清真寺”的苏丹·哈桑清真寺。整座清真寺肃穆庄严，雄浑庞大，宣礼塔高达近百米，相当于30多层楼高。近前，人们会感到自身的渺小。

“宇宙的大都会，世界的花园，人群密集的地方，一个用城堡、宫殿和清真寺装饰的城市，众多寺院和宣礼塔勾勒出她的地平线，而博学的月光和星光将它照亮”。这是14世纪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伊本·赫尔顿游览埃及时对开罗的生动描述。有人认为，这一描述十分到位，因为开罗在正式建城后的近1400年间，一直都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这里，伊斯兰文化的精髓和属性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本版责任编辑：王小光